

首届农业考古国际
学术讨论会论文

来自《耕织图》诞生地的报告

臧 军

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杭州临安

来自《耕织图》诞生地的报告

臧 军

举世瞩目的《耕织图》最初诞生于八百年前南宋绍兴初年的京畿临安府郊区——於潜县，当时，於潜县令楼璩忠于职守、笃意民事，深入乡野，细访农民耕作蚕织生产过程，绘成图文并茂、通俗形象的四十五幅耕织技术普及宣传画，对后世影响甚巨。於潜县于1958年并入昌化县，1960年又随昌化县划归临安县。作为一名生活在《耕织图》诞生地的年轻史志工作者，弘扬优秀的地域文化当为己任，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我对《耕织图》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但由于自己资料欠缺、孤陋寡闻、学识浅薄，对事物的认识多难以深入，常囿于一知半解。谨将一管之见陈述于纸，提交本次“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旨在获得与会中外学者、专家、教授们的指点，恳请诸位先生不吝教诲。

一、《耕织图》作者故乡寻迹

1. 史籍对楼璩生平的记载

楼璩，《宋史》无传，仅清光绪三年刻本《鄞县志·人物》和民国《鄞县通志人物编》（抽印本）见有传文。楼钥《攻媿集·跋扬州伯父〈耕织图〉》、清光绪《於潜县志·秩官志》、阮葵生《茶余客话》、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宋慈抱《两浙著述考》等籍及一些笔记中虽然也有楼璩的记载，但多为零星简单的文字。历史的疏忽，造成了今天的遗憾，由于文字记录的匮乏，楼璩生平的详细资

料迄今仍未能全面了解。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蒋文光先生在其所撰《从〈耕织图〉刻石看宋代的农业和蚕桑》一文（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认为楼涛是浙江奉化人。其实严格地讲，楼涛祖籍可谓奉化，而楼涛本人应该说是鄞县人。如《於潜县志》、《鄞县志》等皆记载楼涛为鄞县人，1090年生，1162年卒，享年73岁。民国25年（1936年）编成的《鄞县通志人物编·仕绩》载：“楼涛，字寿玉，一字国器，以父异任得官，佐婺州（今金华），岁贡素罗，苟民不能堪，涛为州将诣行所，奏请朝廷为损其数，州县输纳至者多不省轻重，予夺在吏。涛以其多寡所当出者大书揭之。兰溪大猾造乱，涛即日行县，尽得其情，诛之。除知於潜县，笃意民事，为耕织二图……改通判邵州，除行在审计司。广州贾胡讼市舶使无状，上命选使者参知政事，孙近荐涛，遂提举广南。到官尽削前弊，较量珍货，诸番咸服。绍兴十五年（1145年）为福建市舶使，历荆湖北路南路，转运判官。其漕湖南，适安抚使以病死，摄州事狱讼淹一日而诀遣之。淮南残于兵，多旷土，朝廷今起赋，涛第以垦，以耕者闻，无一毫加增。积官右朝大夫，奉化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涛~~初~~度高胜，晚自扬州归，画《六逸四贤图》以寄兴。……涛既归，尚置腴田五百亩，取范仲淹规模为义庄，以活宗族之不给者。滨江有堤坏，以钱百万倡率里人共修之”。光绪《於潜县志·秩官志》称其为仕期间“麾节所至，多著声绩”，且注明“《清崇祀名宦》有传”。楼钥《攻媿集·跋扬州伯父〈耕织图〉》云：楼涛“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南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维扬持麾节，十有余载。以为义庄，宗党被赐者近王纪，则其居时，惠利之及民者多矣”且“喜与雅士游”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楼涛，异子，字寿玉，一字国器，除於潜令，以课最闻，绍兴中累官至朝议大夫，持节十有余年，所至多著声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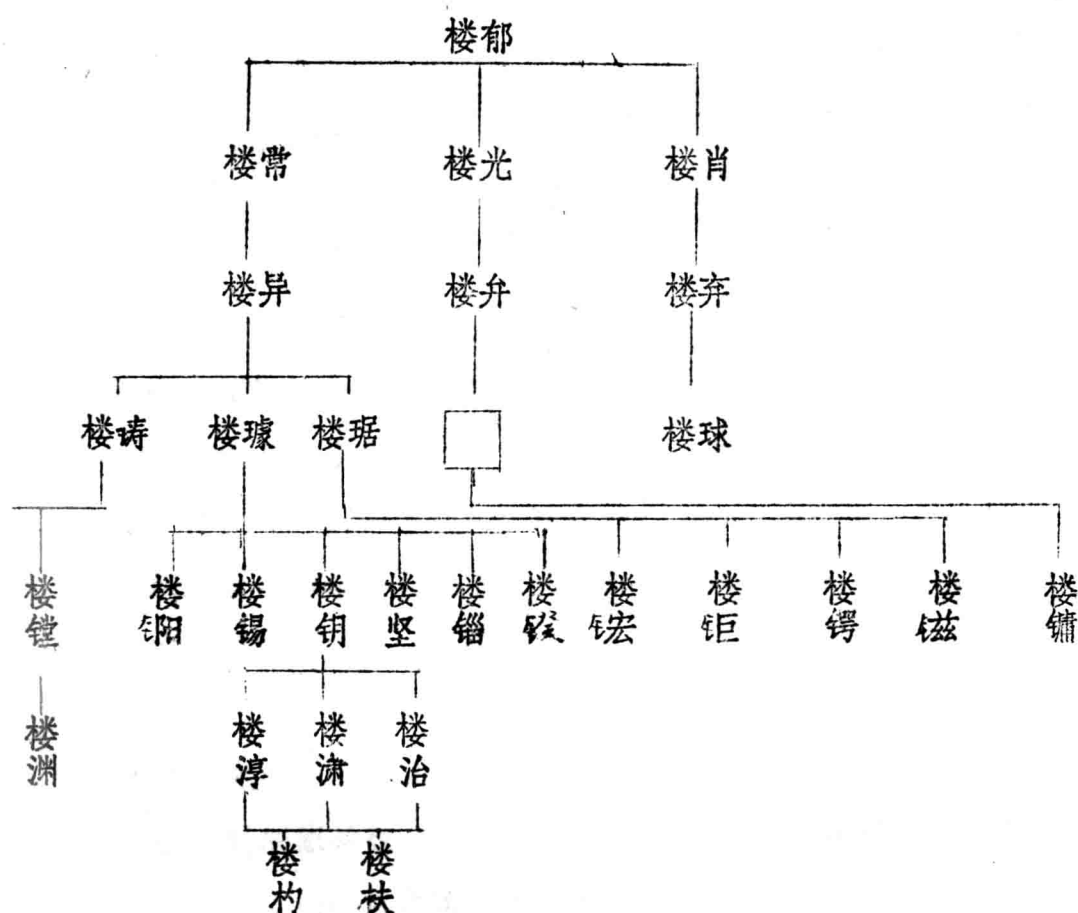
耕织图诗。”光绪《歙县志》谓：“楼涛，字寿玉，一字国器，鄞县人，……初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转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师淮阳，麾书所至，多著声绩”。由是可见：(1)楼涛是鄞县人无疑，且出生于望族世家；(2)楼涛为官较为廉政，善体恤民情，办事讲究实效；(3)楼涛多才多艺，处世乐观、志趣高雅，尤工于绘画，常以画寄情，这是其绘制《耕织图》必不可少的条件；(4)晚年功成身退隐居故里鄞县之后，仍忧国忧民，助民为乐，深为百姓所崇敬。

2. 楼涛家族迁居鄞县的历史

今年六月作者专程赴楼涛故乡——鄞县洞桥乡洞桥村寻访楼涛家族的踪迹。有幸得到鄞县方志办专事鄞县望族研究的张志国先生和《奉化县志》主编胡元福先生的指点。楼氏，原籍浙江奉化，今奉化民间仍保留有楼氏家谱。大约在北宋中后期，楼郁一支自奉化迁入鄞县洞桥定居，故其多被误认为奉化人。楼郁，“字子文，庆历中为郡县教授，前后三十余年，乡人翕然师之，登皇祐进士，官至大理评事致仕卒。学者称西湖先生”。^①其在鄞县时曾“就妙音院立孔子象讲贯经史，学者宗之”在收徒讲学同时，赋诗作文，有《唐书解题》三十卷和《遗集》三十卷传世。^②楼郁生有三个儿子，即楼常、楼光、楼肖。三兄弟都只生一个儿子，即楼常生有楼异，楼光生有楼弁、楼肖生有楼弃。楼异《宋史》有传。^③其传曰：“楼异，字试可，明州奉化人（应为鄞县人，此误），进士高第，调汾州司理参军，徙永兴虞策幕府监，……治湖田七百二十顷，岁得谷三万六千，加其龙图阁秘阁修撰。……进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卒”。楼异在元符年间（1098—1100）知登封县（今属河南）时作有《嵩山二十四咏》，登封县有刻石。也许由于楼异喜爱艺术的缘故，他的三个儿子受其影响，均在文学艺术上颇有造诣。长子楼涛有《耕织图诗》传也，而次子楼璩著有《括苍志补遗》和《鄞峰漫录》七册等籍，三子楼琚也因有文

学成就而载入《鄞县志》。楼涛仅生有一子楼鏐，楼鏐史书未载，《鄞县志》亦无考。楼璩生有六子，其中楼钥是全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宋史》有传^④，《鄞县志》亦为其入传。楼钥，字“大防，隆兴进士，历知温州曾兼中书舍人、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卒谥宣献，……通贯经史，文辞精博，善大字，自号攻媿主人”^⑤著有《金滕图说》、《乐书正误》、《北行日记》、《范文正公年谱》、《玉牒会要》、《圣政书》、《攻媿集题跋》十卷、《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别本攻媿集》三十二卷、《诗集》十卷等。并在鄞县办有“东楼藏书楼”，藏书为当时鄞县十家私人藏书最丰者^⑥。鄞县人称其为“楼太师”。^⑦楼钥的儿子楼淳、楼肃、楼治，俱嗜学能诗。楼淳官至屯田郎中、楼肃历任临安府通判，楼治权兵部侍郎。而楼钥的孙子楼杓，少时性慧，与弟楼 无不善诗，兄弟两曾为上虞县令、知秦州^⑧。可见楼氏家族在文学和仕绩方面皆有相当的地位，在两宋时期成为鄞县的四大家族之一，对鄞县文化、经济发展颇有影响。宋以后，楼氏家族开始衰落。明代，尚有后裔楼绍、楼澄、楼宏、楼序、楼治等，却多湮没。文学上略有成就者仅有楼恂、楼裕、楼达父子，楼得达等寥寥几人，但其与楼涛的世系辈份迄今未明。清时，仅楼一枝在文学上小有名声而入县志。其余多为平庸之辈。现据《鄞县志》及有关材料粗绘两宋楼氏世系表于后。部分辈份关系未明的，未纳入该表。相信楼氏家族史料的发掘，无疑将极有助于对《耕织图》作者楼涛的研究。

· 两宋鄞县楼氏世系表 ·



3. 楼畴故乡鄞县洞桥村印象

楼畴的故乡鄞县洞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据村内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即有人类活动。两宋时期，洞桥村最为兴旺，人才多出^⑨。洞桥村以村内横跨光溪河（又名南塘河）的洞桥命名，该桥建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后屡毁屡修，今存者为民国37年（1948）重修。（见图一）村落民居分布在悠悠东去的光溪河两岸，楼氏家族自北宋始一直生活在这条悠久的小河畔，楼钥曾在洞桥建有气势宏伟的住宅，结构为九开十明堂，分东楼西楼和外楼三处，

东西楼为楼钥居宅，外楼为楼钥迎接贵宾的官厅，有24间走马楼。其楼距南塘河约200米，用长1.75米，宽0.75米，厚12公分的大石板铺成“前街路”。明末，建筑已有毁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尚存部分房屋，1958年多毁，今仅存一山一池一井^⑩。岁月流逝，苍海桑田，迄今楼氏后裔多已翻盖了新居（图二），保留至今的楼氏旧居为数寥寥，且多已经过一番整修，很难再现其原貌，这些为数极少的旧居仍为楼氏后裔所居住（图三）。楼氏在历史上是洞桥村的望族，人口也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有清一代则日衰月谢，今全村楼氏仅有50余户、100余人，（全村有近600户、1600人）楼氏人口仅占全村人口的十分之一。在洞桥村烂田畈中心仍留有精工石砌牌楼楼氏大墓一处（是否楼诗墓待考），洞桥人俗称其为楼家坟前畈^⑪。

洞桥村地势低洼，海拔仅在5.6至6.5米之间，向以种植水稻为主。光溪河横贯其间，遇雨易涝，久晴则旱，当地有“烂田畈，烂田畈，蚂蝗象扁担，田螺象鸭蛋，一阵大雨水过畈，七天无雨叫讨饭”的俗语，因此，洞桥人向重水利。洞桥村历史上又以种植席草、编织草席为主要副业收入，男耕、女织（织草席）便是洞桥村自古以来传统的生产方式。楼诗出生于崇尚文化的仕宦之家，又生活在男耕女织的南方乡村，自幼受其熏陶，耳濡目染，对南方水田耕作，妇女编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比较熟悉，这就为他后来绘制《耕织图》打下了坚固的生活基础。

二、《耕织图》诞生地的耕织历史

1. 功绩卓著的於潜县令楼诗

恩格斯认为：“农业是全部古代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古训“民以食为天”、“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更明确

地告诉人们要解决衣食问题最主要的是依靠农业生产^⑬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自古以来执政者都采取农本主义的立场，提倡以农治国，以巩固其统治。南宋虽偏安临安（杭州），其版图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农业产量最高的江、淮、湖、广等地都在南宋，而两浙尤居首要地位。由于战争需支出巨额军费，求和苟安也要大量供品，只有农村才是唯一的财源。南方气候温暖，旷土较多，正适宜于进一步发展农桑生产，增加赋税收入，巩固统治。因此高宗即位之初，就下诏劝农桑，还设立了劝农使，奖励州县官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丝织业，并以此作为官吏考绩的一项重要内容。^⑭楼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任於潜县令的。“对于身居县令要职的楼涛来说，完成征收赋税是其职责，而《耕织图》的制作正是这一职责而采取的劝农政策”，于是《耕织图》就在特殊的前提下产生了。^⑮

清光绪《於潜县志》卷十《秩官志·官师》载：“楼涛，鄞县人，《崇祀名宦》有传”。又见《秩官志·名宦》：“楼涛，字寿玉，一字国器，鄞县人。绍兴间为於潜令，笃意民事，田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系以五言诗。未几，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寻因荐入召封，进呈御览，即蒙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于屏间。”除此之外，《於潜县志》对楼涛任内的政绩只字未提。据浙江省农科院蚕桑研究所蒋猷龙先生考证，楼涛在绍兴二年至四年间（即1132至1134年）任於潜县令，绍兴五年（1135年）后，楼涛就调任邵州、广州、福建、潭州、扬州的通判、市舶使，安抚使等要职^⑯。楼涛在於潜仅任县官三年。楼涛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享年73岁，由是可知其任於潜令并绘《耕织图》时，年龄当在42至44岁。这段时间正是人生道路上成熟的黄金季节，其谙熟农耕蚕织的详细操作过程，进行写实描摹，形成直观的图象，并旁赋五言诗以作解释，

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南宋时期於潜地区的耕织工艺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一科技美术作品不仅为於潜人民乃至浙江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形象史料遗产，更为祖国乃至世界灿烂的文化增写了光辉的一页。楼涛为官仅有十余年，尽管他也曾有过其它政绩，但他最大的功绩还是在于绘制了《耕织图》这一对后世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的历史画卷。在宋至元、明、清各朝，以致日本、朝鲜各国纷纷以楼涛《耕织图》为范本，临摹、仿绘、木刻、石印、石刻；出现了内容大致相同而风格各异的多种《耕织图》版本，广为流传。无怪乎，楼涛的《耕织图》被人誉为“我国最早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世界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①⑦}迄至现代《耕织图》成了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①⑧}通过它不仅可了解当时的农桑生产情况，而且还是研究历代绘画、木刻、石刻的艺术水平，风俗习惯、服饰等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日本学者对楼涛的《耕织图》颇感兴趣，深有研究，日本东海大学文学部教授渡部武先生认为在楼涛《耕织图》以前的“那些显示稼穡之艰难的劝戒性的农民画，……并不是专门描写农业技术，而是从儒家的劝戒主义观点进行绘制的。所以，要从这些绘画中汲取农业技术史料，就存在很多的问题”。而楼涛的《耕织图》则“将稻作技术、蚕桑技术的实际情形汇编成实用的图卷，无疑也是楼涛的一大功绩”^{①⑨}。可见楼涛《耕织图》的价值关键在于写实，楼涛的功绩也在于如实形象地记载了当时的农耕蚕织的现状。

2. 於潜县耕织发展概述

从於潜境内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陶片可见，早在新石器时期即有人类蕃息。相传夏后少康之后封越，分支庶居此，在於潜阿顶山尚留有越王坪古迹。^{②①}“秦徙大越鸟语人置之翳”^{②②}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於翳县，正式建置自此始^{②③}迄今已有2100年历史。

於潜地处浙江西部，天目溪自北而南纵贯全境，上游为山区，中游为丘陵地区，下游则形成一片较大的河谷小平原。自古以来，以农为主，农、林、桑并举。尤其是天目溪中下游的藻溪、对石、潜阳、太阳、景村、马山、堰口、乐平一带多以农桑为主。唐时，於潜的丝织品就已成为外贸和贡赋之品，唐开元年间（713至741年）於潜上贡的有绋纒、纹纒、白编纒，元和年间（806至820年）上贡的有白编纒^{②③}五代，石镜镇（今临安县 距於潜30公里，原於潜、临安、昌化今已融为一体，其农桑事业难以明显区分，故部分叙述融和三县，下同）人钱繆为吴越国王后，采取“世方蝶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国策，“劝民农桑”^{②④}史载钱繆“善诱黎氓……八蚕桑拓”采用各种方法劝导黎民百姓经营蚕桑丝织，一年之中蚕可八熟^{②⑤}不但农村“桑麻遍野”，城镇也是“春巷摘桑喧咤女”，於潜临安等地的农桑事业由此得以较大的发展，当时临安功臣山净渡寺等地种植了大面积的桑树^{②⑥}后梁贞明六年（915年）钱繆衣锦还乡，盛宴父老，“山林皆覆以锦”，以示故乡蚕织的繁荣，反映当时蚕织盛况的街道名称“绣衣坊”、“衣锦坊”曾长期沿用。

宋熙宁六年（1073年）杭州通判苏东坡巡视於潜时所写《山林》诗中有“桑枝碍引路，瓜蔓网疏离”之句，可见当时於潜乡村种桑之普遍。同时，苏东坡在江、浙、皖水稻盛产地推广“秧马”这一当时尚较先进的农作新工具，於潜境内也已有使用，这在楼涛的《耕织图诗·插秧》中有所反映：“我教插秧马，代劳民莫忘”。宋室南渡后，统治者更重农桑，对京城临安近郊县的农桑事业尤为重视，常派朝廷官员巡行各县，督促地方官劝农工桑，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京城郊县的农桑发展。於潜县位于首都临安（杭州）行政区内，是当时稻作、养蚕技术最为发达的地方^{②⑦}，其所产丝茧也以洁白细密，质优闻名而列为佳品，据《浙江丝绸史》引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七记

载：钱唐名妓苏小小的阿姐盼奴一次向商人诱取百匹丝绢，就指名要“於潜官绢”。当时，仅於潜县的丝织贡品就有“本色绢八千二百四十匹，细五百四十七匹有奇，绵五千六百七十九两有奇”^{②7}。仕途的需要和农桑事业的兴旺，促使身为於潜县令的楼涛绘成《耕织图》，同时，《耕织图》的绘成又反过来促进於潜乃至全国的农桑事业。当时楼涛的《耕织图》有正本和副本之别，正本进呈宋高宗，被翰林图画院精致摹绘成彩色绢本，收于宫内，成为皇帝、皇后了解与监督农桑的参考资料和艺术欣赏品。副本留在家中，后由楼涛的侄儿楼钥题跋，其孙楼洪、楼深仿此画刻于石，予以保留，并在民间流传^{②8}。由于楼涛《耕织图》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为后代统治者所提倡，又因《耕织图》“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其情”，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处于此”。直观形象，通俗易懂，便于传诵，雅俗共赏，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和生产技术普及推广的功效作用，颇受政府官员的青睐和广大农民的欢迎，因此，“一时朝野传诵几遍”，各州县府中均绘有《耕织图》，甚至连“郡县所治大门东西壁皆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②9}。一时兴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耕织图》热潮。元、明时期，於潜的耕织业缓慢发展，史志书籍所载也寥如晨星。

清初，“旗兵放马纵牧，残损桑田”，致使於潜等地造成桑叶奇缺，“桑叶怕贵丝怕贱，卖丝不够买叶钱”^{③0}。后，统治者察觉到“公私仰给，惟蚕丝是赖”，遂开始重视与恢复蚕业。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命焦秉贞仿楼涛图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写序，印发各地，劝谕农桑。后，雍正、乾隆各朝也予效法，摹绘《耕织图》以示重农工桑，一时摹刻《耕织图》之风再次大盛，一些石刻、窗户木雕、瓷器彩绘、织花纹样等都有《耕织图》的绘图案（见图四）。嘉庆时，仁宗六十大寿，“夹路彩廊，左为耕图，右为

织图，用绢为田夫红女，按农桑事次第，各录御制诗一篇，凡四十楹”^{③①}，一些农书也以各种形式摹刻《耕织图》，而一些县级机构亦刻板印发《耕织图》，如光绪《於潜县志》和嘉庆《计方县志》等均有《耕织图》。由此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耕织图》热潮。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於潜的农桑得以较快的发展。据光绪《於潜县志·凡俗志》载：“蚕桑之利，合境皆有，南乡地暖，植尤盛。所出丝东乡为上”。“民生大计，首重农桑，潜邑男务耕耘，女勤蚕织”。“月令季春劝蚕事，邑中户户养蚕足”^{③②}并在《食货志》中详细介绍了养蚕种桑的生产技巧，时於潜盛产细、绢、绵细等蚕丝织品^{③③}。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光绪年间包括於潜、临安等9县在内的杭州府产茧16万担，仅次于17万担的湖州府，而高于14万担的嘉兴府。

民国6年（1917）由于机动缫丝业的兴起，蚕农逐步由传统的自缫自织或出售土丝转为出售鲜茧。民国19年，於潜和临安、昌化有茧行25家、茧灶143副，收购春夏茧8982担，其中於潜1680担、临安5802担、昌化1500担。民国22年，於潜、临安、昌化有蚕农21695户，占农户的46%；有桑园5.03万亩，占耕地的8.6%，产茧2.98万担。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在桑树、蚕种、养蚕方法、缫丝技术上都有了改进。民国23年，於潜、昌化被列为全省十六个蚕业改良区之一，《甌西日报》民国28年2月27日报道：“省蚕丝统制委员会率同专家来临安、於潜、昌化一带视察，赞称三县之丝茧品质佳良，缫折颇优，而於潜所产之丝茧尤为优良。令收茧商人特别提高价格”。民国35年还引种日本桑苗1万株，后逐渐淘汰高大的乔木桑（在楼涛、焦秉贞、何太青的《耕织图·采桑》中均绘制有高大的乔木桑，人登梯上树而采桑叶，甚为不便）为中杆和矮杆桑，并将桑园向山地上发展，减少耕地的占有率。

在《耕织图》中可见南宋蚕农就已注重适时收蚁，稚蚕加温和选叶、壮蚕稀座饱食和上簇加温，迄民国，则提倡共同催青、稚蚕共育，消毒防病。1979年始，於潜等地“三秋”养蚕布局改为“两秋”，催青设专室，加温设备始用木炭火缸，后改电炉、空调机。1985年每亩桑园产茧108斤，每张蚕种产茧79.18斤，1987年茧农每户产茧量达175斤，1988年天目溪中下游的乐平、潜阳、堰口、紫水诸乡产茧均在2000担以上。

悠久的传统丝织业促进了现代丝织业的发展。楼涛《耕织图》所绘缫丝、纺织机具已达到相当完备的水平，其中“攀花”一图的大型提花机，机上有双经轴和十片综，上有提花工，下有织工，互相呼应，正在织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机^{③④}可见南宋时，於潜地区的丝织织造业已相当发达。这种提花机，是我国独创运用花本控制的提综程序原理制成的，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手工程序控制机构，这一技术原理直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即600多年以后）才被法国工匠嘉卡消化吸收改进为机械式的嘉卡提花机，从而才开创了产业革命丝织大工业生产机械程控提花机的新时代^{③⑤}由此可见《耕织图》绘制对全世界产业革命的推动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及至民国30年（1941）10月，在盛产佳茧的於潜太阳创办浙西第二丝织厂，利用当地蚕茧，进行丝织品加工，惜不久停办^{③⑥}随着境内原料茧的不断增长，于1966年5月创建了临安丝厂（后名丝绸总厂），成批生产白厂丝，由于白厂丝以地产优质蚕茧缫制，均匀、光洁、切断少，色泽柔和，手感柔软，通气性好，适用于织造各类高档和薄型的真丝织物，1983年被评为省优质产品、部优质产品。1966至1988生产1541吨，大部分出口日本及西欧诸国^{③⑦}该厂自1986年始还生产全真丝提花丝织物“14336桑波缎”，采用平经经纬、经缎起花、纬缎作地，缎面花纹饱满，富有立体感，手感柔软滑爽，光泽柔和，弹性

华贵大方，至1988年生产19.68万米，外销至英、法、苏联、阿根廷和南斯拉夫等国，并被评为省优质产品。^③1966年藻溪等公社缫丝厂相继创办，1978年全县就有纺织工业企业11家，工业总产值655万元。1984年起，乡办、村办和户办、联户办纺织工业企业激增，同年建立浙西丝织厂，有丝织机174台。（见图五、六）

地处於潜最南端、天目溪下游河谷小平原地带的乐平乡，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素有种桑养蚕习惯。楼涛《耕织图》的许多画面就采自该地蚕户养蚕丝织生产，在古老的蚕织传统影响下，近年来的蚕桑事业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该乡养蚕一年五次，即春蚕、夏蚕，秋蚕、晚蚕、冬蚕，蚕户一般一次家养2至5张蚕种，每张蚕种可产茧90斤。1990年全乡桑园2715亩，连片葱郁翠绿分布在天目溪畔（见图七），有85%以上的农户养蚕，年产茧270吨，为全县主要的蚕茧基地之一，可谓是“蚕桑之乡”。仅乐平村村民罗水才夫妇两人在90年就养蚕15.5张，产茧1182斤，茧款收入9600元；1991年又养蚕17.5张，现在养的夏蚕正在大眠（见图八），罗水才也因养蚕而远近闻名。蚕桑发展促进丝织业的发展，1976年乡丝织印染厂建成，1986年又建立乡绸厂，加工本地茧丝外销。1991年7月，绸厂有42台绸机、175名职工，年产值200余万元；而丝织印染厂规模更大，有职工300余人，年创税利100万元，成为全县乡办企业的佼佼者（见图九）。

悠久的丝织文化随着历史的积淀，不知不觉中渗透进现代农民的意识，於潜人继承了楼涛《耕织图》中描绘的“男务耕耘，女勤蚕织”的传统，1986年位于天目溪中下游、地处杭徽公路沿线的於潜区对石、藻溪、横塘等乡镇，以织造绸缎、化纤布为主要产品的家庭纺织工业户达673户，占该三乡总农户的12.27%。^④仅1987

年对石乡绸机织户的人均收入就达2000元，较全县农民人均收入1033元高出近千元。1990年，全县有织机18000余台，其中於潜有5000余台，而被誉为“丝织之乡”的藻溪镇就有上千台织绸机，镇上80%以上的农户都拥有绸机（见图十），小小的山镇竟有800余户农户拥有绸机，一般每户拥有1至3台绸机，而略为殷富者拥有规模较大的“400锭捻丝机”（见图十一）和成套的丝织机器设备。镇上新辟一条街道，两旁均是星罗棋布，比肩接踵的丝绸商店、织机零配件及修理店，是名副其实的“丝绸街”。镇上还专辟有“丝绸市场”（见图十二）设摊位180处，每天成交额均在50万元以上，交易的有丝和绸缎被面，仅农户织造的丝绸被面一天就至少要外销5万余条，销往除台湾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苏联、印度、缅甸、日本等国，余杭、萧山诸县虽也没有市绸市场，但多不直接生产，而从藻溪丝绸市场购进货源。迄今这一“丝绸市场”已成为全国丝绸被面生产基地中最大的市场。

3. 中外学者访问《耕织图》故乡。

於潜因楼涛的《耕织图》而闻名，近年来，陆续有不少中外学者、农业史研究专家、蚕桑学家、新闻记者等专程赴《耕织图》诞生地——於潜地区考察。

1988年秋，浙江电视台获悉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耕织图》绘于於潜县的消息，随即派记者走访了县内有关知情者，摄制了楼涛《耕织图》部分版本录象镜头，并结合於潜古今耕织发展历史在省电视台进行了专题报导，以弘扬於潜悠久的农桑文化，扩大於潜的知名度，争取传统丝织品的更多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

座落在北京的我国第一所以农业为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设有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史、农业资源区划、水产等三个基础陈列馆。在古代农业科技史陈列馆馆首陈列的就是二十二幅耕图

和二十二幅织图组成的巨大画面，此《耕织图》为清焦秉贞本放大本。整个陈列馆以《耕织图》为起点，点出了我国自宋以来男耕女织、农副结合、农桑并举的历史。为进一步丰富馆藏，1988年底与1989年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金葆华女士一行3人按图索骥，两次南下，深入於潜农村考察《耕织图》诞生地的古代农具，寻找《耕织图》上描绘的“水车”和草编蓑衣，并在於潜仿造《耕织图》所绘水车运往北京陈列。

1987年11月，日本信州大学教授岛崎昭典博士在浙江农业大学讲学后，偕夫人慕名专程赴於潜考察《耕织图》故乡的耕织新貌。浙江省蚕桑学会理事长冯家新教授和杭州市蚕桑学会副理事长倪银昌高级农艺师等人陪同岛崎昭典教授走访了於潜天目溪下游，蚕桑生产密集的乐平乡，考察了乐平乡丝织厂、乐平丝绸印染厂和两户蚕桑养殖重点农户。嗣后，又赴於潜镇在於潜招待所前留影（见图十三），并在於潜招待所听取倪银昌先生介绍光绪《於潜县志·耕织图》情况（见图十四）。旋至农民家庭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於潜区对石乡桂芳桥，参观了农民家庭丝织业迅猛发展的盛况。最后，还观看了县内较大的丝织企业浙西丝织厂和临安丝绸总厂的丝织生产规模与过程。日本学者的来访，不仅促进了中日双方的学术交流活动，更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三、《耕织图》版本考略

自楼璩《耕织图》之后，历代摹本、刻本、仿本、石刻甚多，仅日本学者渡部武先生就已经涉及过56种《耕织图》^①。并且受《耕织图》的启发与影响，耕织绘图的范围、内容从南方渗透到北方，从水田耕作扩展为旱地耕作，从蚕桑丝织演化为植棉纺棉……版本最多、影响最大者当数南宋与清朝。与此同时，诸多《耕织图》版本也逐渐传至日本、朝鲜等国，与当地的绘画艺术和耕作实际相融合，又派生出一批各具风格的《耕织图》在朝野流传。作者所知有版本38种，其中国内27种，国外11种。参照学习浙江丝绸工学院赵丰、浙江农科院蒋猷龙、中国农业博物馆王潮生、中国历史博物馆蒋文光和李露露、黑龙江博物馆林桂英、郑州大学荆三林和李趁有、台北大学赵雅书、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等诸位先生、教授的文章，谨对《耕织图》的版本发展以及清光绪《於潜县志·耕织图》的情况，综合补充介绍如下：

1·国内版本

(1)宋代(11种)

楼璩《耕织图》正本 楼璩绘图时分有正、副两本，正本进呈宋高宗，惜此正本图早已失传，仅存五言诗四十五首（耕二十一，织二十四）。

楼璩副本 此本留在家中，后曾刻石，流传民间，今已不见。宁宗嘉定三年（1210）此副本被楼璩之孙楼洪、楼深进呈东官^①。

楼钥本 钥为璩之侄，善诗画，曾临摹楼璩副本而作有《耕织图》，其“亲书诗章，并录跋语，装为二轴”^②，进献宫内，供